

文

化



史

中国侠文化史

中国

侠

行踪无常的游侠，

一诺千金的豪侠，抑强扶弱的义侠，

神出鬼没的盗侠，温文尔雅的儒侠，

中国侠文化史

风流倜傥的情侠，能言善语的智侠，

飒爽英姿的女侠，

狂放不羁的怪侠，叱咤风云的奇侠……

曹正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K 203
C 167
1

中国

侠

文化史

曹正文

0 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 赵南荣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侠文化史

曹正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插页平4精7 字数 288,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1—4,000册 精1—1,000册

ISBN7-5321-1132-6/1.850 定价: 平12.30元

ISBN7 5321-1133-4/1.851 定价: 精16.50元

序 一

章培恒

中国的侠文化虽出现于小说形成之前，但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它却以小说作为自己的主要载体。不过，在唐宋传奇中，“侠”所占的比重还很小；元明小说的所谓“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里，可以与“侠”挂上钩的，也只有《水浒传》一部，而且在这以后产生的两部小说名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又都不属于“侠”的范畴。直到清代后期，《三侠五义》、《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一大批侠义小说问世，局面才开始改观。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如雨后春笋，其数量之巨，作家之多，读者之广，进展之速，均非晚清的侠义小说所能望其项背，侠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期武侠小说在大陆几已销声匿迹，但它在港台却仍在继续发展。随着梁羽生、金庸、古龙诸氏在这一领域的相继操觚，新武侠小说崛起，其内容和技术较之旧派武侠小说均有长足的进步，从而大大提高了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在名著不断涌现的同时，文化、学术界的上层对它也已公开表示接受，并有不少人予以赞扬，不像以前的旧派武侠小说被普遍认为只是小市民的读物；文化学术界的上层虽

然也有人喜爱，却从不在公众场合为它美言几句。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港台的新武侠小说开始进入大陆，同样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在大陆也引发了创作武侠小说的热潮。总之，新武侠小说为侠文化带来了新的兴盛。

由上所述，可知中国的侠文化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在最近的七八十年中经历了两次高潮，已使它成为一种影响既巨且深的文化现象，理应引起严肃的学术工作者的重视和研究。

可惜的是，这类研究著作现今还是太少。曹正文先生此书则是这方面的一项可喜的——也许称得上是重大的——收获。

我想，这部《中国侠文化史》至少有以下三项成就：

第一，“侠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第一次把“侠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展历史。由于新武侠小说声势的浩大及其在文学上的地位的提高，市上已有“武侠小说史”一类的著作出版，这当然是可喜的事。然而，武侠小说为什么能在这七八十年中如此迅猛地发展，获得如此众多的读者？这固然有赖于武侠小说作者的努力和才智，但也不可忽略了文化背景。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外畅销小说在译成中文以后，虽然也有销路很好的，但总比不上畅销的新武侠小说巨著（个别由于政治影响而特别畅销的外国小说译本不包括在内）。这并不是因为金庸先生等的成就和功力超过了一切外国畅销小说的作者，而是文化背景在起作用。所以，就事论事地研究武侠小说是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而必须跟整个文化土壤联系起来。但这并非一蹴可就。因此首先应把武侠小说跟中国历史上关于“侠”的种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曹正文先生首倡“侠文化”这一概念（我在本文中使用时，实近于鹦鹉学舌），恐怕正是充分体认到了这种整体性；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就有助于武侠小说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作为研究中国侠文化史的第一部著作，曹正文先

生在书中收集了许多武侠小说以外的“侠文化”现象，这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其筚路蓝缕之功，殊足钦佩。

第二，把“侠文化”作为平民意识的体现，并以此观点贯穿全书。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观点。鲁迅原就把《水浒传》和《三侠五义》、《施公案》等都视为“民心”的抒写，不过他的这一看法至少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未被注意，也许是觉得应予否定而又不好明说。其实，《水浒传》里之所以还有若干反政府的英雄而《三侠五义》等书里的英雄都只是大僚——当然是“清官”——的驯从，那就因为清代后期的平民意识与元末明初的平民意识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不同也正是统治阶级的“治绩”。而新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等人的作品——里的英雄截然有别于展昭、黄天霸等人，则正说明了当时当地的平民意识已挣脱了黄天霸等人的奴才观念，把个人的权利、自由、幸福看作是天经地义、不可侵犯的东西，反对将个人作为别人或某个集体的附属品；这是只要看看《鹿鼎记》对神龙教的极度憎恶和刻骨讽刺就可以知道的。从这一点来说，一部武侠小说史或侠文化史实在反映了平民意识演变的历史。而曹正文先生的这部书也就使我们对侠文化或武侠小说的演进能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第三，侠文化或武侠小说是由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出现而达到迄今为止的最高潮的，因此，港台的新武侠小说理应成为这项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市上已有的武侠小说史著作，对这部分却由于资料不足，略而不详。曹正文先生则以三年多时间，读完了五百多套新旧武侠小说，书中对港台武侠小说作家作品如数家珍，作了具体而扼要的介绍。由于所据乃是第一手资料，故其评价也都确有所见，而非人云亦云。仅就这一点来说，曹正文先生的这部书就是对武侠小说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我想，凭着上述的这一系列成就，曹正文先生这部书的出版，无疑会对中国武侠小说史和侠文化史的研究发生有益的推进作用。

1993年夏记于复旦大学

序 二

温瑞安

一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武侠小说。那时我未曾上学。也就是说,正式在学校上课念书之前,我已在看武侠小说。我是生长在跟中国大陆本土有一段漫长海陆空距离的南洋(东南亚)的一个半岛上,而且,我居住在那半岛(马来西亚——那时还是叫做“马来亚”)的一个相当荒僻的小镇(霹雳州美罗埠)的火车站附近(俗称美罗埠火车头——离美罗山城约三英里半,当时只有数十户人家),能够感受得到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色彩熏陶。由此可见,武侠小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媒介。

之后,我又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地读了许多武侠小说,年纪稍长之后,转而对纯文学(尤其是现代诗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我不能对每一本武侠小说都读遍,每一部都喜欢,只是在私下作了比较:为什么我喜欢,何以我不喜欢,喜欢的我就介绍给大家看,不喜欢的就忘掉它。

我在学校里不同的班上也常常“代课”——老师后来或告退的时候,我就选讲武侠小说,有时边讲边创造情节,有的教师干

脆邀我“主讲”，他们也三五成群，就在“台下”“听课”，使我的“不自量力”因受鼓励而变本加厉，终于也执笔写起武侠小说来，把同学的名字（当然我喜欢的就写成忠的，不喜欢的就写成奸的）组成了小说中的武侠人物，起先在班上传阅，后来在香港的《武侠春秋》上连载。

这段时期，我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容易的。在马来西亚的教育文凭里，中文决非必修课。中学时期，我曾转校到纯马来（即巫文：是当地的国语）学校去念书，说一句华语（或方言），给学校当局“抓到了”，还得要罚款或罚站堂哩。但我最先接触到的武侠小说，提供了我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根基，它终于推动我走向参与中文文学创作。试想，我距那么遥远的所在，而我且是一个小镇里的一个少年，因为通过读武侠小说，我终于衔接上中国文学博大精深的根。

我坚信我只是其中一人，我相信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在各处、各地、各个不同的时候，也蒙受过这“武侠文化”甘霖的滋润。通过读武侠小说，开始喜爱上中国文学，这决不会是我一个人。

不过，当时的我也有所疑惑：人人都说武侠小说一味只知暴力，打打杀杀，无知幼稚，虚妄不实，决非文学——怎么大家对“武侠小说”的偏见如此之深，但它的流传又如此之广，即使骂它的人，也忍不住要看它；不肯看它的人，也决躲不开它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例如：报纸连载，电台广播，人们谈论得津津有味……）。既然任何作品（就算是打着“文学”旗号的作品）都存在瑰宝与糟粕，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评论家来正视这么多优秀作家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影响了那么多优秀读者的这个事实呢？什么是好的武侠小说？什么是不成功的武侠作品？如果它有不良的杂质，我们是否能把它提炼得更好？要是它已有优

良的品质，为何我们不予以发扬光大？

那时候，武侠小说的精华已影响了我做人处世的看法，我也尝试出建立自己的看法：“侠出自于伟大的同情”、“止戈为武”、“侠是知识分子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指标”、“武者不为侠”、“知行合一、救人于难才是侠”、“侠是重信诺、守信义”……我也相信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里的一种独特类型，而“侠义”亦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种特色。

可惜，也可悲的是，一般人仍对它嗤之以鼻，认为这类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把阅读这类小说的人视为低级无聊，好像“看武侠小说”竟是一种“罪行”。大家一面试它，一面骂它，一面笑它，一面侮辱它，却不愿花时间去研究它。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期待有一部对武侠小说传说、历史、文化取向、精神价值、文学评介作全面的研究比较的专业论著，期待有一部真正能对中国“侠文化”的历史和意义、传统与延续，贯通古今、综合分析的、文笔动人的中国武侠小说史问世。

直至我认识了曹正文。

二

1990年我认识了曹正文，并知道他正耗时费力、苦心孤诣地撰写《中国侠文化史》。

我生平交友颇多，但能交上曹正文这样的朋友，绝对是我的福气。他的特色和优点，十分之多，我只举出其中四项，让熟知他的朋友共鸣，和让还没有熟悉他的朋友分享。

（一）曹正文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子。要知道有才华的人不一定有学问，而有学问的人不见得有才情。因此，才情与学识兼具的人并不多见。曹正文绝对是相当罕见也非常杰出的一位。

他是自学成材的作家。在撰写和出版这部《中国侠文化史》之前，他已出版了三十部作品。他曾在工厂当过十年工人，当过翻砂工、搬运工、磨工，但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忘进修，终于卓然有成。且看他自二十五岁起出版迄今的部分著作书目：从《咏鸟诗话》、《群芳诗话》到《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这一类作品属于文学评论随笔的范畴；从历史小说《唐伯虎落第》、武侠小说《三夺芙蓉剑》到推理小说《紫色的诱惑》，以及文学故事《近代名人暗杀风云录》，这些属于各种类型的小说创作；或者是知识小品集《米舒博士谈读书》，或者是新闻学论著《旧上海报刊史话》、心理学著作《愿你喜欢我》，乃至他主编的《中国一百名人谈读书》等作品……从他的写作书目来看，类型之多，题材之宽，学识之博，视角之广，可以说是非才气纵横、笔力淋漓不能臻幽。

况且，他的作品从不故弄玄虚，炫耀才学，他一贯主张写作应以普通大众读者群的相应为依归。他每一部作品都不是空泛之作，而是紧扣人心，深入发掘资料与题材，以生花之笔从容道来。所以他指出：“任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必定要雅俗共赏”，又强调：“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显赫一时而终究湮灭于世的宫廷文学家，而努力做一个以文学作品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代言人。”

且看他创作的一部推理小说《四十岁男人的困惑》，他也试图要为中国式推理小说闯荡摸索（有别于西洋、日本推理小说）出一条自己的路，同时也是中国的路来。

由此，他对写作的态度，令人起敬。

（二）曹正文不仅是一个学问渊博、才气纵横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记者好编辑。

他完全不靠任何关系，以投稿而进入上海新闻界与文坛。他先在《文汇报》理论部编文史稿，后在《解放日报》文艺部编杂文。

1981年上海《新民晚报》复刊，他考入该报当记者，撰写社会新闻，不久便调入副刊部编“夜光杯”副刊，现为该报“读书乐”专版主编。他主编这一副刊，不但办得有声有色，吸引不少书迷成了该报或该版“拥护者”，同时网罗了不少海内外好手名家来为他写稿，而他自己也以“米舒博士”的笔名，主持专栏，为读者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中国大陆最受欢迎和颇具影响力的专栏之一。

他的阅历和编采经验，对于创作、评鉴、编纂工作，当然有着莫大的帮助。很多人有着深厚的学力从事文史之作，但在经验、眼界与胸襟上，却不足以将才学尽情发挥，以致有所局限；接触面广、交游广阔的他，为他写作提供了启示。

（三）曹正文对武侠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有着极为深沉丰富的知识，以及自成一家的独创之见。

他曾写过一部《古龙小说艺术谈》，那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古龙的专著，甚至在海外亦是第一册古龙武侠小说的评论。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作为一个真正的论评者所必需的眼界、胸襟与胆气，他都一一具备了。

难得的是，他除了是一位对武侠小说和中国侠义文化传统研究经年的评论者之外，同时也是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之一，他写过《龙凤双侠》等多部武侠小说。他兼备创作、评论双角度，可以“出得、入得”，左右逢源，时就文学价值品评，时为历史流变定位，时替作家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反之），他撰写《中国侠文化史》，在“先天”、“后天”上都能称职。

（四）曹正文还是位侠者，是个性情中人。

我跟他相交不久，相知却深。我们自1990年通信以来，他两度出国，但因机缘，只见了一面，聚了两次，但这已足够：正文是侠义中人，为人正直，重情守信。

他在跟我还素昧平生之时，已热情来信，为我联络拙著出版之事。我原想请人代洽，应付上佣金，正文兄如此为我奔走费心，为维护我的权益，还据理力争。于是我数度敦请他应收取应得之报酬，但却为他断然拒绝。我再三提出，反而遭来他严正反驳：“……佣金一事，再也勿提，否则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友情了。比起古代侠者，我所作所为，不值一提……”

他的侠心激烈，不止如此。我相信在他笔走龙蛇之余，也一定做了不少为民请命、抱打不平的事，只是他施恩不图报，继续他耿介执著的文侠生涯。

具备以上的特点（还有我许多未及在这篇章里引述的），由曹正文去为“中国侠文化”作传，那是最恰当的事了。

三

我认为：“武侠兴起、武侠发展、武侠改革”三个时期（恰好大致上有三十年），作为一个“武侠人”，在三个不同时期的期盼与感触，可以说明港台新武侠值得重视。至于国内“武侠文化”的状况，读者诸君可能比常在海外的我更加深切了解，我在这里无须赘言了。

经过多年在侠坛上的“闯荡”，我在现阶段仍坚信：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伟大的作品不一定流行，流行的作品不一定伟大，但极伟大的作品必然能流行（试想：《三国》、《红楼》、《水浒》、《西游》、《金瓶》……已流行了几百年了）。通俗是美德，媚俗不可取，但通俗不等同于庸俗。文学艺术应扎根于本土（及传统）的文化之上，才能生根。

新派武侠小说从开创至今已超过三十年，早就不新了，更新的（超新派）的武侠作品不诞生，武侠小说必定没落。每一个时

代必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武侠小说若要推陈出新，就必须要有“时代气息”，写作要有“观千剑而后试器”的锻炼。我试图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武侠小说，要写出动感来，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便宁可不写。要先属于自己的，才能成为时代的。要有民族色彩，才可能国际化。艺术的层次可能大家看法不一，但到最高境界，无论古今中外，不分类型，都是受一致推崇的。

我一直等有人来为侠作传写史著：我终于等到了曹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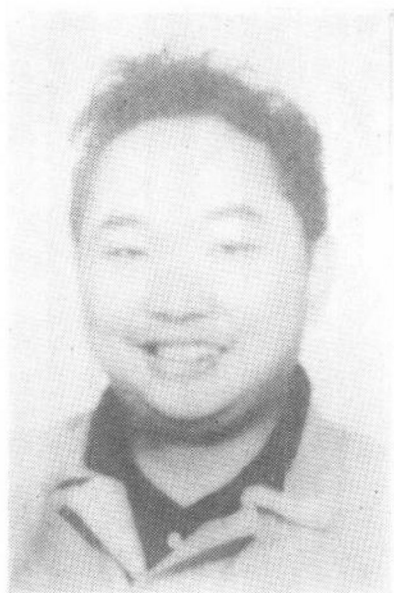
写于1993年3月9日香港大会堂书展参展结束后



寄情山水，吟弄風月；
溫文中有俠氣，談諧中有
牢騷。

曹正文

一九九三年二月廿七



古龙肖像



武侠泰斗 金庸